

近代藏书三十家

增订本

苏 精 著

中华书局

目 次

新 序	1
旧 序	1
盛宣怀愚斋	1
叶昌炽治庸室	8
卢靖知止楼	19
李盛铎木犀轩	25
梁鼎芬葵霜阁	31
叶德辉观古堂	37
章钰四当斋	45
宗舜年咫园	51
张元济涉园	55
董康诵芬室	64
邓邦述群碧楼	72
徐乃昌积学斋	80
丁祖荫湘素楼	86
陶湘涉园	91
傅增湘双鉴楼	98
梁启超饮冰室	108

王克敏知悔斋	118
丁福保诒林精舍	122
叶景葵卷龠	129
伦明续书楼	137
张寿鏞约园	146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	155
朱希祖郿亭	160
吴梅奢摩他室	167
陈群泽存书库	174
周叔弢自庄严龕	179
郑振铎玄览堂	188
潘承厚潘承弼宝山楼	202
藏书之乡 藏书之家	212
张钧衡适园	212
蒋汝藻传书堂	219
刘承幹嘉业堂	225
结 语	232
附录	
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	234
参考书目	247
后 记	275
索 引	277

新 序

自己将近三十年前的这部旧作，竟然还有修订再版的机会，实在是完全想不到的事，因此在写这篇新序时，未下笔而心中先已有些百感交集，这不仅因为三十年毕竟是人生中相当长的历程，更在于时代环境与个人际遇在此期间都已有了绝大的变化。

本书各篇自一九七九年起陆续出版，而于一九八三年结集印行后，来自台湾与大陆素昧平生的多位书评作者的厚爱、一些藏书家后人的联系致意，以及不少藏书史同道的引用与指教，都使我大受鼓舞，我的职务也因本书而获得擢升。照理说我应一本初衷，继续努力于藏书史的探索，以期能有较本书更多更好的成绩，结果我却在不到十年后改变意向，放弃了原有的读书和写作领域，甚至也放弃了赖以谋生的工作。

事实在本书出版后不几年，我已感受到大陆改革开放反映在藏书史的现象，包括史料络绎不绝“出土”、关注与研究持续增加、相关论著大幅增长等等。面临此种新情势，我不免时而反省自己身处海隅应如何为宜的问题。但是，后来促成我决定改变的关键因素，却是缘于工作上的困境，在一名颐指气使的新长官随时否定与羞辱部属的领导作风下，我挣扎、考虑并准备了大约三、四年后，终于辞职离开原以为可安身立命终老的图书馆，也放弃了再过两年多即可达到的退休资格，而以将近半百之年远赴英国进修，并因盘缠不足而变卖勉可居栖的小屋，于是从一九九二年成为无家可归的异域过河卒子，还为此不得不将藏书全抛了，更何况藏书史。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十九世纪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的研究,虽然不能说这与藏书史搭不上丝毫的关系,但是一九九六年底我总算完成学业拼得老命回到台湾后,接连任教于三所大学的不同系所,以致随时都处在准备新课教学的紧张状态,加上自己的研究也从印刷史逐渐倾向十九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并先后出版了我在新领域的三部专书,因此实在无暇也无余力顾及其它。

从八〇年代末预备出国留学至今,我荒废藏书史竟已二十年了。因此,当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底接到中华书局编辑王楠女士来函,希望能印行《近代藏书三十家》的简体字版时,我真是意外惊讶。尽管已长期未耕耘藏书史的领域,我仍约略知道这个领域已有长足的进展,研究者阵容越发壮大而史料日趋丰富,研究范围也越加宽广而研究工夫越深入细密,所得成果则更为丰硕可观。相形之下,本书自然显得陈旧过时,因此我很快地婉谢了重印的建议;但王楠女士继续邀约,结果说动我决定与其藏拙,不如予以修订再版,以就教于广大的简体字读者。于是从二〇〇八年元旦开始,我放下手边的十九世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心修订本书。

当年撰写本书的宗旨,是就卒于民国元年以后的藏书家,撰介其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及与藏书有关的行实等项。事实由于每位藏书家存世可得的史料多寡完缺一,因此撰写时不能不迁就史料,无法求其形式的完整与篇幅的一致。此次修订依然如此,并不影响原书各篇的结构与风格为原则,实际上修订包含文字与内容两方面。在文字方面,因为我自己将全书约十五万字重新逐字键入计算机,因此随录随改,遍及所有三十家。在内容方面,则除梁鼎芬与梁启超两家没有变动以外,其他二十八家的内容都有所修订,包含增加、删除、修改及正误四种情形,每家修订程度不一,少者或许不满百字,多者约有七八百字;同时在本来的三十家以外,又新增原书出版后撰写的《周叔弢自庄严龛》一篇(刊登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五期),但书名仍旧不变。

此次修订的主要依据,是一九八三年原书出版迄今个人所见的一些新

史料(含研究论著),以及我知悉的各方批评指教原书内容的高见,因此我要特别感谢这些新史料的发掘者、研究者、出版者、批评者及提供者等,如果修订版内容还能有所寸进的话,实应归之于他们,我并在参考书目中特别列出新增的部分,以资醒目并志谢忱。

虽然我一时没有重拾藏书史的计划,而且此次修订也只费了一个月工夫而已,不过这段期间我确实是心无旁骛,每日自晨至昏专一于此,最多时在一天内完成《郑振铎玄览堂》一篇九千余字的打字与修订工作。惭愧的是自己学殖荒落,又已多年脱离此道,以致有心把握难得机会善加修订,却无力挥洒如椽之笔去芜生新,因此修订的范围和深度相当有限,虽然缴卷,心虚汗颜不已。但无论如何,拙书因本次机缘而意外获得新的生命,多少也弥补了我钻研藏书史初衷半途而废的遗憾,这要感谢中华书局王楠编辑,以及协助我寻找资料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张蓉斌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赖芊卉两位小姐,也感谢出版原书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慨允修订再版。

苏 精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撰于台北斯为福斋

又:此次修订本所有新增图片,均系王楠编辑费心多方蒐罗商借选用,谨此声明;而原藏诸家慨允借用,隆情高谊,并此致谢。二〇〇九年元月三日校后补记。

旧序

一九七六年，我进入“中央图书馆”服务，得以在工作余暇浏览馆藏善本古籍，每见书中历代藏家钤印累累，或朱墨圈点题跋，心中既仰慕先贤爱书读书之勤，又时时感叹自来藏书不易、聚散无常；稍久以后便兴起搜集藏书家资料，并加以整理介绍的念头。同时，我注意到近代关于藏书家故实的撰述，从最著名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以后，几乎都以叙述至清末为断，事实上数十年来由于战祸连结，中华典籍的浩劫更甚于从前，加上社会变迁导致私人藏书事业急遽式微，都使得近代藏书及藏书家的文献亡佚极多，再不及时搜罗保存，以后将更难着手。于是我决定以卒于民国元年（1912）以后的藏书家为对象，撰介其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及与藏书有关的行实等项，每家并列参考书目。

搜集资料的工作，除在我服务的“中央图书馆”及台湾分馆进行外，曾利用过的国内资源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及其文学院分馆、《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等处，而以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赐我最多。此外，我直接利用过或申请影印资料的包括：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中山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两处东洋学文献中心、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图书馆、哈佛研究所图书馆、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其中以得自冯平山图书馆为多。

几年中，我总算陆续搜集到一些藏书家的资料。可惜的是并非每家都

详尽足征,有的家世背景不详,有的生卒时间不明,有的藏书事迹过于简略等等,如要等候资料齐全才着手整理,说不定都白头难待了,于是决定一面搜集,一面就其中资料较多的先行整理撰写。到一九七九年初,我在图书馆的工作,增加本馆旧档的保管一项,这些旧档的时间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南京创馆,到三十七年(1948)迁台为止。在清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里,有部分是当年购买古书的记录,意外惊喜之余,便以此为骨干并参照其他数据,写成《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承《传记文学》杂志登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号上,成为我从事藏书家撰介工作以来,最先发表的文章。以后陆续撰成的藏书家,大约半数以上都登在《传记文学》上,此外《明报月刊》、《中央图书馆馆刊》、《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也各采用了一篇。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收到包括藏书家后人的一些读者意见,我自己又新增加若干资料,据以修订后连同不曾发表过的部分,汇印成这本书。

遗憾的是有些藏书家的资料,明知目前仍然存世,实际却无法获得,例如大陆所藏盛宣怀的《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十八卷、徐乃昌的《积学斋藏书记》四卷、吴梅的《瞿安书目》稿本等等;从本书后面所附的各家参考书目,可以看出这些资料上的缺失,也因此我对每位藏书家的介绍,虽然预定包括前述的家世生平等五项,但事实上却没有完全做到,对此我是难辞率尔之讥的。此外,由于个人的浅陋,各家内容错误的地方,也期待读者的指正。同时,民国以来的藏书家,当然不会只是本书收录的这些而已,有待记述扬摧的正多,希望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介绍。

感谢所有在我搜集、整理、撰写期间,指点和协助我的先生女士,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黎树添馆长和吴荣子女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仲一诚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尾崎雄一郎教授、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万惟英馆长、台湾大学叶达雄先生和王民信先生、“中央图书馆”胡欧兰女士,以及海内外图书馆界许多热诚的同道。谢谢同事卢锦堂先生为我审阅原稿一过并多所指正,更谢谢《传记文学》社刘绍唐社长予我刊登和汇印出

版的机会。还要一提正在国中求学的小女苏茜，她在这些岁月里，体念我父兼母职的心情和公私的忙碌，总在晚上相聚的时候，人各一灯，读书相伴，并给我最大的亲情支柱。

又本书书名墨迹系集自傅增湘亲笔所书《双鉴楼藏书续记》序文，附此注明。

苏 精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盛宣怀愚斋

生平简历

盛宣怀，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年署止叟，江苏武进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二十四日。他的祖父盛隆，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官至浙江海宁知州；父亲盛康，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湖北盐法道、武昌道，署浙江按察使。盛氏虽是读书世家，宣怀在科举上却不如意，自二十三岁补县学生员后，十年中三应乡试都告失利，只好绝意于此，专心求事功上的发展。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在陕西剿回，盛宣怀经人荐入幕中，担任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以后便因受知李鸿章而起家。从同治十二年（1873）起，接连总管所谓轮电路矿四政的招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汉冶萍公司，再加上织造、商务、外交、教育等事业，盛宣怀掌握的实在不只一人一地



盛宣怀像

的经济命脉而已，他的理财正有如翁同龢所说的“今之卜式桑羊也”^①。而盛宣怀青云直上，由淮军幕客入官，而关道，而京卿，而侍郎，而尚书，不论他后来如何成为武进乡人众矢之的，但确是人才辈出的武进自嘉道以来第一位尚书侍郎^②。宣统中，盛宣怀以铁路风潮为资政院参奏，奉旨革职永不叙用；辛亥革命时，一度避至日本；民国后继续掌理招商局与汉冶萍公司，直到民国五年（1916）三月二十五日卒于上海，享年七十三岁。

愚斋藏书

盛宣怀不以藏书著名，一般人也不知愚斋中藏书极富。事实上盛宣怀在治事余暇，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尤其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他的宦途起伏不定，以及宣统元年（1909）遭丧子之痛时，亟以此道遣怀。以他聚资之富和门下之众，收藏图书自是轻而易举，例如王存善（子展）、陶湘（兰泉）、宗舜年（子戴）等人，都精于版本目录，可助宣怀一臂之力。他又托人四处打听收购^③，因此数年中大有收获，所藏已达十余万卷，包含苏州江标“灵鹫阁”、湖南巴陵方功惠“小玲珑馆”等旧藏不少^④。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盛宣怀赴日治病，在就医之外，或亲自选购，或命人物色，而日本各书肆听说这位中国达官贵人兼书林豪客到来，也纷纷望门送书，冀得青睐。盛宣怀采取随阅随购的方式，而且新旧和汉不拘，先后购买了一千五百部以上^⑤。

盛宣怀对于图书倒看得开。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和两江总督端方相约，各出所藏在上海合建一所“淞滨金石图书馆”，公诸天下后世，他还先刻就一方“貽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的印章^⑥。以后端方或因有所不舍，对于盛宣怀的几度催促践约都没有下文，他无奈只好自行其志。在东

①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② 程沧波，《影印武阳县志序》，页3。

③ 盛宣怀，《盛宣怀未刊信函》，页210，《寄吕尚书函》，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④ 缪荃孙等编，《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叙》，叶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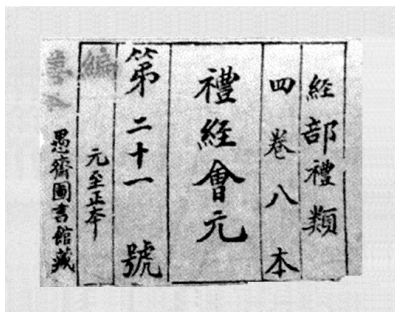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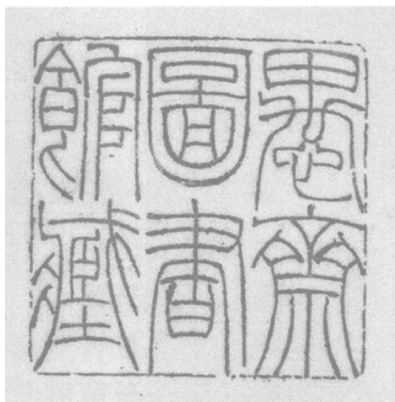
⑤ 盛宣怀，《愚斋存稿附东游日记》，叶37、72。

⑥ 同注③，页204，《致前南北洋大臣端午帅函》，宣统元年十二月十日。

游日本的行程中,包括考察规模最大的帝国图书馆、经营方式最新的私立大桥图书馆等,准备借镜之用。盛宣怀回国以后,即在上海的寓所旁拨地十余亩,构建一所“愚斋图书馆”;他并亲营规划、布置庭园,到宣统二年(1910)九月落成,获皇帝颁赐“惠周多士”匾额^⑦。又延请缪荃孙编纂书目,却多年没能成事,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盛氏义庄准备变卖,愚斋图书馆也遭波及,于是以五个月时间匆促编成《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印行,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共六千六百六十六种、六万六千六百零七册,加上当时还未分类的书,总计多达八千三百八十种、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五册。

愚斋书目好不容易才告问世,盛宣怀

费许多心血建立的愚斋藏书却很快地保存不住,聚散之速不亚于其财富事业。其中的精善本已在抗战中流出,由上海的中国书店整批购下数十箱后再行转售^⑧,甚至流落海外,由日本天理图书馆整批收购达二百三十六部^⑨。至于数量庞大的普通本,盛氏家属早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分别捐赠圣约翰大学、山西铭贤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改成的交通大学。圣约翰所得最多,即愚斋书目中分类编就的六万六千余册,包含明刊本近五百部、日本刊本五百部、方志六百余部(七部为孤本)、医书三百余部(三十二部为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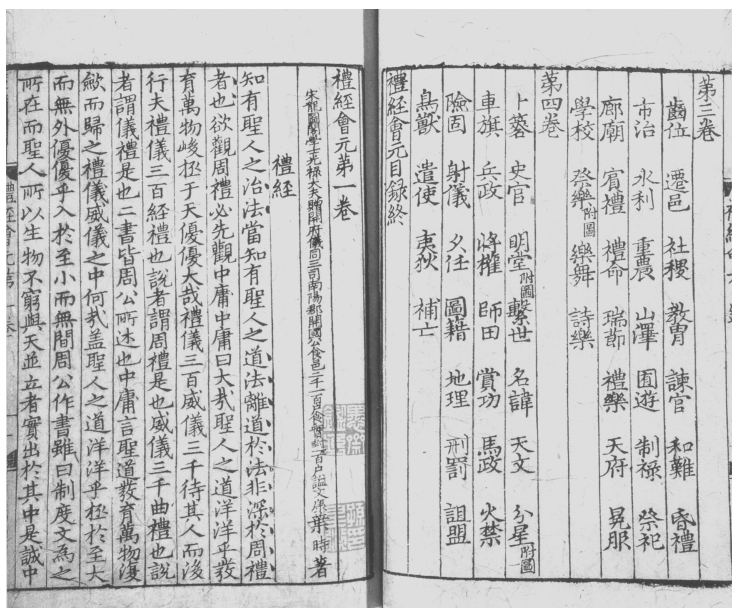


愚斋图书馆藏书印及
图书分类编号卡

⑦ 《大清宣统政纪》，卷四二，叶21，宣统二年八月壬子。

⑧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续记》八、《席刻唐诗百家》，九、《唐诗类苑》。

⑨ 吴平，《盛宣怀与愚斋藏书》，页57。据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所载，如明版《程氏墨苑》、《新刻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等书，都钤有“愚斋图书馆”藏印。



愚斋藏书(钤“愚斋鉴定印”)

圣约翰所得在一九五一年又调拨给华东师范大学^⑩。其次，交通大学获得六百多部、一万六千余册，其中经该馆列为善本者三百八十五部，约五分之一为日本刻本^⑪，交大所得在一九五六年调拨给安徽师范大学。至于铭贤学校，一九四九年以后接连改称山西农学院与农业大学，所得愚斋旧藏据悉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荡然无存^⑫。

藏书以外，盛宣怀藏金石书画也多，他曾收购以研究明史著名的王颂蔚旧藏明人尺牍数百札，也计划在愚斋图书馆落成后，再建一所艺术馆，自他的藏书散尽以后，金石书画不知下落如何？

⑩ 同上注。周子美，《周子美学述》，页 28-29。

⑪ 《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善本书目》，页 6-34，“愚斋藏书”。

⑫ 郑麦，《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页 67。

刊刻与著述

藏书以外，盛宣怀也刻书，刻的且是乡贤遗著及卫生丛书。其实从盛宣怀的父亲时已从事刊刻，同治十二年（1873）盛康由于王文韶与翁同龢的怂恿，刻了一部《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八十册，当时还年轻多暇的宣怀，奉父命详加勘订，全部工作到光绪二年（1876）才完成。光绪十六年（1890），高龄近八十的盛康又手辑道咸同光四朝文章，历时七载刊成《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原来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年间，到光绪中同时有多家纂辑续编，以完成时间先后而言，盛氏居于第三，与名列第二的葛士浚所编书名卷数相同，但因葛书内容多出当时热门的洋务二十卷，其风行程度也因而凌驾盛书之上。

光绪二十年（1894），盛宣怀延请缪荃孙主持《常州先哲遗书》的刊印事宜，预计分为三集，共九十五种，除向亲朋友好借印外，又托人抄校杭州文澜阁的善本；缪荃孙并特地远赴湖北，请来有天下第一好手令誉的陶子麟刻字。三年后初集问世，包括四十种、六十四册，绝大部分是明人以前的撰著。初集完成以后，进度缓慢下来，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嘱缪荃孙作一结束^⑬，又得三十种、四十册，即做为续集。清末刊印郡邑丛书的风气很盛，但精滥高下悬殊，《常州先哲遗书》既有盛宣怀不惜巨费，又得缪荃孙主持，因此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对盛宣怀苛责至再，谓“祸天下者此人”的叶昌炽^⑭，也不能不称道他此种留心乡邦文献的举动^⑮；叶德辉更认为这部丛书抉择严谨、刻工精良，足为以后刻书者师法^⑯。或者有人会说，盛宣怀的刻书是聚敛之余沽名钓誉，但不知在闻其名即掩鼻却走的常州士大夫中，有无其先人的撰著竟赖宣怀此举才得以传世的？

⑬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叶18-19，《常州先哲遗书正续集缘起》。

⑭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一四，叶37，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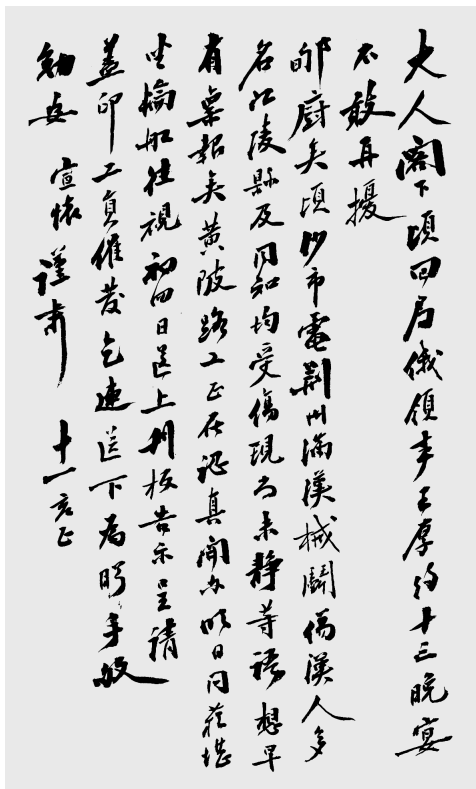
⑮ 同上注，记七，叶16，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四日。

⑯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刻乡先哲之书》。

至于较特殊的“卫生丛书”，则是日无暇晷而苦于疾病缠身的盛宣怀，晚年深深体验“大丈夫有精神方能有事业”的道理^⑮，而于宣统民国之际着手刊印的。事实盛宣怀注重养生也反映在自己收藏的图书上，《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显示收藏医书达二百九十六种，比儒家类的二百二十三种多出甚多，并冠于子部各类书^⑯。

盛宣怀又重视译书，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南洋公学时，除列有译书课程外，并附设“译书院”，延聘张元济为院长。三年后盛宣怀奏报译印成果，包括政教财法及兵学各类图书二十八种。再过两年，南洋公学呈请上海道台袁树勋立案保护版权的书目中，增加到五十四种^⑰。盛宣怀从日本治病考察回国后，曾在上海创立“东文译书会”，由丁福保、刘成志主持，雇用日文学生八人，分章翻译他从日本携回的《明治财政史》；又亲函驻日公使胡惟德，托购各类参考书籍，预备翻译一套财政丛书，可惜这个计划随着他的黜免与避赴日本作罢，《明治财政史》虽译成但未刊行。

盛宣怀本人以文案幕僚起家，笔下自然不凡，张之洞曾推许为幕府人才



盛宣怀书札（孟宪钧先生提供）

^⑮ 同注③，页159，《致外务部尚书那琴轩函稿》，宣统元年二月五日。

^⑯ 同注④，子部总目。

^⑰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书影，页30，《满清政府保护版权布告实例》。

之最^②，他在官居高位以后，只要是施政大计仍亲自起稿。民国以后，盛氏家人在旧日僚属的协助下，陆续纂辑奏议二十三卷、电报七十七卷，刊成《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一百卷。由于他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密切关系，这部初刊一再重印，至今不衰，恐怕以盛宣怀洞见精能的才识，也难以预料自己的遗稿在数十年后仍如此洛阳纸贵吧！

^② 同注②。

叶昌炽治廨室

越人吴籍

叶昌炽，字鞠常，晚年慕庄子“缘督以为经”的中和自然之道，自号缘督庐主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月十五日，卒于民国六年（1917）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九岁。

叶昌炽的先世原是浙江绍兴人，在他的高祖时迁到苏州经商，并入籍长洲。他的祖父叶秀荃因家中生意失败，很早便辍学贩卖油豉糊口，后来改行经营布业并因而起家，叶昌炽在日记、文章、题跋中一再提到的“花桥老屋”，便是他祖父在道光年间盖的^①。据说营建时颇受邻居一位进士出身、当过知县的在籍绅士横加阻挠，因此临终前谆谆交代儿子叶震荣，务必让下一代读书博取科第争一口气^②。叶震荣继承先业不久，遭逢太平天国之役，以致家境又告中落，当



叶昌炽像

① 花桥在苏州城中稍近齐门处，因唐朝白居易卸任苏州刺史后，回忆当地有诗“扬州驿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头”而闻名。

② 叶昌炽，《奇觚闻文集》，卷下，叶 50-52，《先祖竹斋公事略》。